

鼓浪学术书系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



现代诗人和现代诗

高波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鼓浪学术书系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

现代诗人和现代诗

高波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诗人和现代诗/高波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2

(鼓浪学术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

ISBN 7 - 222 - 04630 - 5

I. 现... II. 高...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 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2511 号

责任编辑: 张 旭

装帧设计: 杨晓东 孟嘉福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名	现代诗人和现代诗
作者	高 波
出版者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地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地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版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印刷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书号	ISBN 7 - 222 - 04630 - 5
定价	20.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丛书

总序

朱水涌

组织撰写这套丛书，还得从一个可以称作当代“学案”的学术事件说起。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几位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在严家炎先生的主持下，承担了国家“七五”重点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课题研究，意在“着眼于打通近、现、当代”，“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中国最近九十多年小说发展的总体特征及规律”，“还包括了对正在行进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用历史的眼光进行总结，并对今后小说创作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①按照课题的设计，这是一部“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专深的文学史”，属于“专家的文学史”，^②不仅要“概括出整个世纪小说总体性的历史特征及发展的基本线索”，还要“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创立二十世纪小说史的新格局”，“更注重于研究格局与方法的创新”。^③全书分为七卷：1897～1916 年为第一卷，1917～1927 年为第二卷，1928～1937 年为第三卷，1937～1949 年为第四卷，1949～1976 年为第五卷，1977～1984 年为第六卷，1985 年以后为第七卷，各卷分别由陈

^{①③}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前言》，《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陈平原：《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99 页。

平原、严家炎、吴福辉、钱理群、洪子诚和黄子平承担供稿。如此宏大的学术工程，如此强大的学术阵容，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那时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从那时起，学术界就翘首以盼这一项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不仅因为人们相信这批学者这项工程能拿出最可信赖的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项学术工程恰恰是对于那时刚刚提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新范畴的一次重要的具体实践。

1985 年，北京大学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第 5 期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正式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就“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了他们三人的 6 篇对话。“20 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原先由国家制度不同而割裂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连结起来，更主要的是它蕴含着倡导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确认、评价和考察的新视野与新尺度。北大的三位学者认为“20 世纪中国文学”是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是中国文学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这里，“体现民族意识”是一个统摄的观念，在这个统摄的观念下，他们为“20 世纪中国文学”概括出三个方面的特征：走向世界的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和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及现代语言结构、表现形式。在那个主流政治文化与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一致性诉诸于现代化呼求的时代，在文学研究以“拓展文学的思维空间”和倡导启蒙文化的“文学主体性”为使命的那个时期，“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极具轰动效应的，它让学术界许多人“受到了强烈的震动”，^① 得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多数人的认

^① 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2 页。

同与呼应。1987年复旦大学陈思和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部撰写于“20世纪中学文学”提出的同一年的论作，同样以“现代意识”来统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整体，强调“现代意识”不仅是新文学发展的总主题，而且也是“八十年代的当代精神”，是研究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时代精神融合进对文学史的评价”。^①这之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与实践，便被人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称作‘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二阶段是被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三阶段是被称作‘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时期”。^②而以“20世纪中国文学”重新命名的“重写文学史”浪潮应声而至，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沟通起来考察、研究的文学史教材、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包括以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论著纷纷出现，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变。

然而，就在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热潮中，为学术界寄予最大厚望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在1989年出版了陈平原著的第一卷之后便戛然而止。如今10多年过去了，尽管这些“小说史”的承担者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相应的宝贵的研究成果，但那部“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专深的文学史”，依然只是让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开头。在学术界，没有人会怀疑严家炎先生所带领的这批学者的学养、史识、对史料的占有和著作《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功力，但《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为何迟迟未能与读者见面，甚至到了某种不到半途就废了的地步？这也就是说的可以称为“学案”的问题。

①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② 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部小说史的范畴上？“20世纪中国小说史”显然来自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念。当也是这部小说史的主要作者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这个理念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转型所提供的经验，确实遭遇到了学术界的质疑。王富仁就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将新文学与新文化的起步前移，是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与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价值，也模糊了新旧文化的本质差别，他从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以及语言革命两方面论证了“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合理性。^①许志英也提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往前挪移”，是“看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应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无形中也就忽略或者说抹杀了五四文学革命之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他坚持以1917年为界把中国文学分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则可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②而不少学者则从维新派思想与五四文化先驱的思想、文学改良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对比中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提出批判。学术界质疑的焦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却没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统一的进程、一个整体提出非议。但“起点”的质疑并不会影响“20世纪中国小说史”顺利进行，这不仅因为这是学术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这些质疑大多发生在9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已经为许多海内外学者钩沉与发掘出来。而在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里，作者以文体具体演变为中心，在晚清小说与域外小说的启迪、小说的商品化与

^①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② 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书面化倾向及雅俗等文化影响的关系中，分析了晚清小说的叙事转型，从而有效地揭示出 1897 年之后的小说作为 20 世纪中国小说发端的合理性。“20 世纪中国文学”或“20 世纪中国小说”的概念范畴，并不至于影响了《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撰写，对于这个概念，正如钱理群 1999 年对其反思时所说的：“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①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或许能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份材料我是从《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中读到的。它是在“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课题组成员（除黄子平在国外未能出席外）一次重要的座谈纪要，意在“明确全书的指导思想、体例以及章节安排”。在这次讨论中，对照已经完成的第一卷，小说史的各卷供稿人提出了不少具体的问题，如严家炎、洪子诚提出史与论不能相互损害的问题，钱理群提出不能一概“消解大家”和文学史研究对象是“选择尖端还是选择影响最大”的问题等等。但这些研究和写作中的具体问题显然不会成为“小说史”行进的绊脚石，它们可以在吴福辉讨论中所说的“完全统一不可能，但各卷得有呼应”的原则下得以解决，而且这次讨论会显示出来的，依然是一种扎实、自信和热情前行的学术姿态。也就是在这种热情、扎实的讨论中，我看到了所有参加者对于“突出史识”的认同。讨论中陈平原结合小说史第一卷提出“集中力量表达史家的见解”、“突出作者的史识”的撰史观点，钱理群称其是“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上”的“突破”。

“史识”是个关键词，它蕴含着撰史者考察和叙述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对象的价值判断。它有可能在与历史材料的对话中发生变化，也可能遭遇上不

^①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 年第 1 期。

同的文化语境产生变动，而一旦“史识”发生了问题，则历史就很难叙述下去，更何况是一部以“以突出作者史识”为特色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那里，文学“史识”的体现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他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特征的历史见解：走向世界，改造民族灵魂和悲凉的美学风格，而统摄这三者的核心思想是启蒙。在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所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①“20世纪中国小说史”也是取同样的研究立场，它之所以将现代小说发端的时间前移到“小说界革命”前后，其原因便是启蒙：“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改良群治’；而其主要契机却是戊戌变法的失败。”^②

启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政治情结，在众多的知识分子眼里，推进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与完成国人的思想启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启蒙是可以与现代性划上等号的。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思想启蒙为主流的五四新文学便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文学丰碑，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价值参照和标准。这种由于文化流程的堵塞而形成的悲剧文化心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所普遍具备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启蒙文化情结遭遇上了思想解放的环境，精英知识分子主流难得的与政治

^①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②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文化主导取得共谋，于是一个被称为“新启蒙”或“复归”启蒙的文化文学思潮应运而生。那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是如此自信、坚定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又如此自信、坚定地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无论是“启蒙与救亡”的主题冲突论，还是“文明与愚昧”冲突论，亦或是将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发展概括成“否定之否定”的“圆形”^①，都是因为有了“启蒙”这个坚定的价值支撑而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应当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文学观，是在对“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参照比较中提出的，更是由于发扬新文学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诉求与想象而被确立的。由于启蒙文学的立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被符合历史实际地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这不仅打破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社会制度人为地将现、当代文学割裂开来的文学史叙述，改变了80年代初期“还原历史事实”的拾遗补缺式或批判性的“重写文学史”的简单研究，更重要的是开始建构起以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为核心的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和文学史叙述方式。

然而，以现代性的文化启蒙观替代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观，尽管为我们提供了对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把握与更科学更准确全面的理解，但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依然落入了“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圈套，难以摆脱对立性的思维模式。在启蒙的大旗下，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复杂的文学形态，尤其是五四前后的反现代性文学与50~70年代形成的与五四“悲凉”风格完全不同的“当代文学”，就很难有准确的评价，而可能在批判和否定的层面上，被作为文学发展的低潮或逆流看待；而像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乃至1949年之后文学的内在关联，也难以得到深入的揭示；文人传统下的诸多文学创作成

^①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6页。

就，士大夫气的俯视一切与市民化的创作个案，要纳入启蒙的文学史框架也成了棘手的问题；尤其是 1985 年之后中国文学的庞杂状态，就更难被有条不紊地梳理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这样，当以严谨、学理著称的北大学者回到历史语境与历史文本中，他们启蒙主义的“史识”与丰富的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实的对话就很难达到“互相契合”，在新的“史识”新的价值观念尚未产生之前，理论假设与研究对象之间相互调整、相互修正的关系也难以建立起来。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时，把原本的第一章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性质的文字整章删掉了，这被删掉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规定，应该也就是阻碍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脚步的根本因素。尤其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益明朗化的全球化语境与向大众商业文化主场转移的文化现实，更是无情地将 80 年代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走向世界、完成启蒙的预设击得支离破碎。正如钱理群 1999 年在反思“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时所说：“首先是现实生活的无情事实粉碎了 80 年代关于现代化，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与此联系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①

“前提的追问”逼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历史文本，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来，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研究入手，去揭示出被宏观视野和主流理念所遮蔽的种种文学关联与内在关系，真正把握住一百多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延续和变化的相关内涵和内在理路。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面进行的，无论是“左翼文学”、“17 年文学”、“文革文学”、“晚清小说”研究热潮的兴起，还是对现

^①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 年第 1 期。

当代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或再解读，或者是对 20 世纪文学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新文学内部各种不同组成因素等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五四以来种种文学期刊的研究梳理，都表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了更扎实、更深入的阶段。我们的这套丛书，也是努力从具体关系的问题研究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尽一份现当代文学学者的学术职责。

厦门大学中文系是鲁迅、林语堂、孙伏园、川岛、施蛰存、洪深、徐霞村等现代文学名师巨匠授教工作过的地方，但愿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能让我们的先辈们欣慰！

2005 年 3 月 10 日，于厦门大学海滨

目 录

总 序	朱水涌 (1)
序 言	(1)
一 “审美现代性”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1)
二 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历史梳理	(10)
三 梳理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方法论解释	(16)
李金发：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滥觞	(19)
一 “诗怪”李金发	(19)
二 “诗怪”和“怪诗”	(22)
三 李金发诗作的历史语境	(26)
四 李金发诗作的特质	(32)
五 李金发的诗是“笨谜”吗?	(35)
六 象征诗派的特征与实质	(39)
七 对李金发评价的再评价	(46)
八 李金发的意义	(52)
穆旦：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一面旗帜	(55)
一 穆旦传奇	(55)
二 穆旦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模仿	(59)
三 “扎眼的现代诗意”	(64)
四 “自觉的现代诗艺追求”	(68)
五 《诗八章》：现代诗意和现代诗艺的完美融合	(77)
六 穆旦的眼光	(89)
杨炼：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难得标本	(96)
一 杨炼与蒙眬诗	(96)
二 杨炼诗歌创作的三个时期	(98)

(一) 《乌篷船》——底层关注和恢弘之美	(99)
(二) 《礼魂》——深邃之思与严整之美	(103)
1. 《半坡》	(103)
2. 《敦煌》	(108)
3. 《落日朗》	(110)
(三) 《X》和《大海停止之处》，生存冥想和语言	
迷宫	(116)
三 前后迥异的诗论	(120)
四 杨炼诗论的几个特征	(123)
五 杨炼诗论的迷误辨析	(126)
(一) 关于“删去现实”，“建构智力的空间”	(126)
(二) 关于“万物即语言”，“诗先于语言甚至先于存在”	(128)
海子：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一个另类	(132)
一 “海子神话”的还原	(132)
二 “麦子”和“麦地”：海子的人间情怀	(138)
三 “麦子”和“麦地”意象在海子诗中的多重含义	(144)
四 “麦子”和“麦地”意象在海子诗歌创作中的意义	(150)
五 “王位”和“太阳”：海子的诗歌理想	(159)
六 “通灵”：海子诗艺的民间精髓	(164)
七 诗人使命：海子“大诗”追求所昭示的意义	(173)
于坚：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重大转向	(180)
一 于坚，善于生存的诗人	(180)
二 当代诗坛上一头独步的雄狮	(182)
三 于坚要颠覆什么？	(187)
四 于坚颠覆了什么？	(193)

(一) 诗意图的日常性	(194)
1. 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194)
2. “如实描写”和“零度抒情”	(198)
3. 以日常场景和生活细节呈现生存的丰富和 玄奥	(200)
(二) 表现方式上的叙事性	(203)
1. 生存状态压过故事和人物	(203)
2. 细节压过情节	(204)
3. 展示压过叙述	(205)
(三) 诗歌语言上的口语化	(207)
五 颠覆的乏力	(214)
六 迷惘的突围	(221)
七 诗意云南，不可忽视的寓意和深意	(227)
(一) 生机盎然的土地、生意盎然的人	(229)
(二) 日常的诗意，日常的语言	(230)
(三) 亲近自然、亲近人的自由天性的向往	(232)
八 新路和前景：面向未来地“与自然和谐相处” ...	(236)
结语：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及历史经验	(243)
一 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	(243)
(一) 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局限	(243)
(二) 诗意图之变：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	(248)
(三) 诗人之变：由志士才子到赤子哲人	(251)
二 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历史经验	(254)
(一) 应摒弃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之风	(254)
(二) 应走出西方诗学精神的阴影	(256)
(三) 应重视中国经验的体现和中国立场的建设 ...	(258)

序 言

一 “审美现代性”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这里所说的“现代诗”，还不仅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多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上个世纪以来用白话写的诗，都称作“现代诗”。而在我看来，用白话写的诗，未必就是现代诗。“现代诗”是体现着审美现代性的诗。而那些用白话书写而又未能体现审美现代性的诗，还是将它们称作“新诗”或“白话新诗”为好。

还有这样一种习惯说法：将上个世纪30年代在《现代》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诗篇和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一批诗人，称作“现代诗”和“现代诗人”。而我所要说的“现代诗”，却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诗歌社团或一个诗歌流派。不仅在诗歌形态上，“现代诗”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更重要的是，在诗学精神上，“现代诗”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现代诗”不仅只是一种诗歌风格或诗歌流派，在风格和流派的层面上谈论“现代诗”，是难以全面而深刻地领会“现代诗”在诗歌发展中的变革意义的。“现代诗”是体现着审美现代性的一种新型新质的诗歌。

然而问题立马也就跟着来了。你所说的“审美现代性”，究竟又是什么呢？梳理一下近年来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个问题。

对学界的这样热、那样热，过后又不了了之的讨论，我们也已经习惯了。近年来学界关于“现代性”的热烈讨论，似乎也难逃这样的宿命。在讨论中，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目不暇接，又

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有关“现代性”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在热闹和繁荣中，还显出了学术研究“和国际接轨、同步”的架势。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样的热闹和繁荣中，其不了了之的宿命就已经显现出来。稍加梳理不难看出，许多关于“现代性”的讨论，论者们各自所秉持的立场和逻辑层面，常常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将“现代化”和“现代性”混为一谈，有的则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层面来谈论不同的“现代性”。在这种“各自说话”的喧闹中，难以获得“共识”也就是必然的了。难怪伊夫·瓦岱在北大演讲时感慨说：“现代性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出格，这不但涉及历史、美学、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波及经济、政治和广告领域，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集最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杂音异符混合体。”^①

总括而言，国内外对“现代性”的讨论，主要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社会学的层面，侧重从现代社会体制方面来谈论“现代性”，这样的“现代性”，也就接近“现代化”。例如，西方结构功能学派即倾向于将“现代性”看成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他们不避繁琐地将其概括为：1. 民主化；2. 法制化；3. 工业化；4. 都市化；5. 均富化；6. 福利化；7. 社会阶层流动化；8. 宗教世俗化；9. 教育普及化；10. 知识科学化；11. 信息传播化；12. 人口控制化等等^②。作为布莱尔政府智囊团重要成员之一的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还具体地指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

①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② 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